

# 梦想照进现实

## 我省著名文物鉴定专家陈景顺 30 年收藏路

本报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宋新喜 文/图



从一个爱好收藏瓷器的拖拉机手,到我省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从家中藏品多为仿制品到将 128 件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陈景顺用了 30 年将梦想变成了现实。近日,记者在荥阳听说这位专家家的许多故事,并专程前往采访。

### 初涉钧瓷便入迷

陈景顺说起自己从一名瓷器爱好者入行文物鉴定行业,最终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的原因,竟是因为 30 年前的一次沉痛打击。上世纪 70 年代初,因“文革”中断了学业的陈景顺在家乡农村生产队当上了一名拖拉机手。有一年出差到禹州,路边商店里各色各样的瓷器让他眼花缭乱,后来他才知道这种瓷叫钧瓷。陈景顺就是从这时候喜欢上陶瓷的。当时他为生产队跑运输,每次出差的补助只有 1 块钱,但每逢出差到禹州,他都会从牙缝里挤出钱来搜集瓷器。

为了买更多的瓷片标本,陈景顺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下海”了,他组织过运输队,开过出租车,当过企业领导,生活有了很大改变,但他对瓷片的痴迷却始终没有改变。自从郑州有了古玩旧货市场之后,星期天他经常去逛市场,搜集、购买瓷器等各种古玩。有一天,他结识了一位河南省古陶瓷专家,请他为自己收藏的“古董”进行鉴定,但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原来他过去的藏品大都是仿古制品或赝品,收藏价值不大或根本就没有收藏价值。

### 30 年练就“火眼金睛”

这个刺激使陈景顺想了很久。他突然觉得,收藏对他来说已不再是一种个人的乐趣,更是一种责任。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陈景顺开始阅读历

史书籍,了解每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提高鉴赏水平,四处拜师求学,虚心求教。

陈景顺用 30 年的时间搜集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古瓷片标本 10000 多件,但他不为赚钱,不搞买卖。为了给民间收藏爱好者提供义务服务,他利用古瓷片标本潜心研究,积累了丰富的鉴赏经验,成了打击假文物的鉴赏家。日积月累,陈景顺逐渐掌握了深厚的古陶瓷鉴赏知识。现在只要他下乡搜集标本,就会被村民叫住,请他帮忙认一认家里的老古董,这样陈景顺便成了当地村民的好朋友,农民们知道他喜爱搜集瓷片,便把从田间地头拣来的瓷片送给他,于是陈景顺的收藏更加丰富起来了。

### 百件文物捐献国家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起,陈景顺开始收集流落在民间的稀有文物。在收集过程中,他逐渐迷上了古陶瓷。他先后到过河南省鲁山县唐代段店窑址、宝丰宋代清凉寺窑址、巩义唐三彩窑址和荥阳翟沟窑址等在大陆有一定影响的 100 多个古陶瓷窑址,收集到 2000 多片古陶瓷精品标本和一些完整的文物。他把 2000 多片古陶瓷标本陈列在家中,建立了古陶瓷陈列馆。

由于陈景顺鉴别瓷器的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现在已经成为河南省古陶瓷研究会常务理事、省文物鉴赏家理事,去年被河南电视台《华夏之门》特聘为鉴宝专家。

2001 年 9 月,陈景顺将自己几十年收藏的 128 件珍贵文物捐给了国家。尽管这些珍贵文物凝聚了他多年的心血,也花费了不少积蓄,但陈景顺说服家人毅然把 128 件(套)文物,其中二级文物 3 件,三级文物 34 件,无偿捐了出来,为此他还受到了荥阳市政府的表彰。

## 中牟高考实现新突破

本报讯(记者 王恩俊 通讯员 张校强)16 日下午,记者从中牟县教育局了解到,2007 年中牟县高考再次实现新突破。

据统计,2007 年,中牟县有 7173 名考生参加高考,其中普通高考本科上线人数 2318 人,比 2006 年 1746 人上升 572 人,专科上线人数 3773 人,比 2006 年 2823 人上升 950 人,本科上线人数、上线率均位居郑州市六县(市)第二名,专科上线人数、上线率均位居郑州市六县(市)第一名,中牟一考生孟胜利以 688 分的好成绩获中牟县理科第一名、郑州市第四名,王龙以 683 分的成绩获郑州市第七名,李露莹以 632 分获得中牟县文科第一名。职业学校对口升学本科上线 77 人,是郑州市其他四县市的总和。专科上线 697 人,上线率达到 91.71%,本、专科上线率均是郑州市第一名。

## 放下酒杯子 拿起书本子 荥阳民营企业主 “充电”成时尚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素敏)7 月 12 日,高山陶门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有宏早早结束工作,来到荥阳市工商业联合会聆听《合同法》讲座。此时偌大的礼堂挤满了民营企业主们,他们像小学生们一样认真地听,仔细地做笔记。

荥阳市现有民营企业近万家,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靠着“四千万(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说千言万语,入千家万门)”,把“草根”经济培植成“参天大树”,时下,这些曾以勤奋闯天下的老板们,尝到了“根底浅”的苦头,一些企业在市场大潮中搁浅触礁。

“底子薄”,让荥阳民营企业主们开始反思,一些企业家告别了酒场子,放下了酒杯子,捧起了书本子,开始学习“充电”。不断地学习,使民企老板自身素质得到提高,管理理念得到更新,越来越多的家族式企业步入了现代化企业管理。成立于 1983 年的郑州市嘉盛盛电气发展有限公司深得此益,总经理王甲辰只有高中毕业,1996 年,他参加了中央党校组织的第一批中国民营企业经营管理特训班,学来知识让他处在十字路口的企业化险为夷。由此,十余年来,他不论工作多忙,每年都要定期到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听专家授课,每天都坚持用一个小时上网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知识。知识也让他的小公司由一个以单一机电产品贸易的小商店,发展成为现代化集团公司,目前该集团公司现已成为荥阳第三产业的龙头老大。

## 荥阳五保供养幸福园列入民政部试点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宋新喜)近日,荥阳市五保供养幸福园被民政部确定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单位,列入试点的有北京市东城区等 75 个区、县(市)和中国收养中心等 90 个单位。

“免费吃住穿,小病不出院,大病送医院,住得像宫殿,穿得像军官,环境像花园,三餐像饭店。”这是五保老人对幸福园的评价。为

提高五保集中供养率,让五保对象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时为了解决乡镇敬老院规模小,人员少,设施简陋,供养资金少,生活标准低等问题,荥阳市投资 5000 万元建成了五保供养幸福园,幸福园可供院民就餐、理发、洗澡、洗衣,餐厅可供 1000 人同时就餐,为五保老人提供衣食、健身、娱乐、医疗全方位的服务,目前该园内有院民 630 人。

## 中牟计生创“康乐服务”品牌

本报讯(记者 王恩俊 通讯员 郝新颜)“平时要注意适当的活动,多吃点蔬菜、水果,一旦肚子一阵儿一阵儿地疼,就赶紧去就医。”昨日,“计划生育健康服务快车”的医护人员来到中牟县大孟镇孕产妇张凤琴家,为其进行健康体检并提醒她孕期的注意事项。

如今,“计划生育健康服务快车”走乡村活动,对计划生育对象实行“零距离”服务,

方便了中牟育龄妇女,而这仅仅是中牟县计划生育创“康乐服务”品牌的活动之一。自去年到现在,中牟投入了大量资金对县站、乡所、村室进行规范化建设,在县站、乡中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的基础上,又抽调大量卫生部门医疗技术人员参与,建立了计划生育“康乐服务”团队,为育龄群众开展全方位、系列化、全程式服务。



为了丰富郑州市民的餐桌文化,中牟县刘集乡大力发展郊区型农业,不断引导农民调整种养结构,对愿意发展蔬菜的种植户,乡土地部门和村委积极为农户调整土地,引进了蔬菜新品种。目前全乡种植面积达到 4800 亩,仅此一项就可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300 元。

本报记者 许大桥 通讯员 郝新颜 摄

#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szw@znews.com

## 时政点击

### 由温总理亲自打伞说起

7 月 18 日《深圳晶报》:温家宝总理到安徽阜阳,慰问军民,了解灾情。在其后的报道中,许多媒体采用了一张温家宝总理自己打着雨伞与当地群众握手的照片。近日,有网友在红网论坛上发帖,将这一照片与其他几张在雨中检查工作或讲话时有专人打伞的一些官员照片放在一起,形成“打伞组照”,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干部作风。

撑一把伞,倒一杯茶,大约算不上什么难事,奇怪的是,这些最简单的生活细节一旦贴上“行政作为”的标签,就从私事领域上升为公共事务——既然是公共事务,当然就得有公务人员专职去做。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那幅著名的照片:一个正在台上讲话的官员,站在身后为他打伞的人居然是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姑娘!2007 年 6 月 13 日,英国伦敦,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球场冒雨参加英国草地网球协会新总部在罗汉普顿落成开幕的典礼,一个人撑着一把透明伞端庄地站在屋檐下,一如“邻家迷了路的老太太”,温情而让人动容。其实我们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榜样:2003 年国庆节期间,温家宝在渭河大堤察看灾情时自己撑着伞;2005 年 7 月,温家宝总理在广西梧州冒雨察看滑坡自己撑着伞……遗憾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常常看到礼仪小姐撑伞的辛苦程度取决于某些领导讲稿的长度。

自己撑一把伞当然不难,难就难在身为公仆了,在公众场合能否放低身段?手里掌握的公权有没有泛化或个体特权?“与民为善”究竟是一种体制压力还是心态惯性使然?一把雨伞隐喻的政治生态是复杂而多元的:一是我们向来有放大“公共事务”的习惯,结果就是使得某些官员的个人义务异化为公共权利。本质而言,公务人员与技术工人一样,只是职业分工的差异,没有任何个人特权可言,但是,我们见过为工人撑伞的吗?即便是经理、董事,好像也没有某些官员如此夸张。根源恰在于我们的官员缺乏一种底线的“生活规范”,在权力归属上不是很清爽的时候,这种缺位鼓动个人私欲无限膨胀,不爱走路、不愿端茶倒水等等,生活与工作向“寄生”方向发展。二是如此官本位根深蒂固,还在于“官位寻租”缺乏技术含量。就经济学而言,职业选择应该置收入路径和消费路径于不顾,只考虑如何使财富最大化。孟子就很坦白:“做官是为穷”。一旦公权力能“脱壳”,官位才可能神圣而畅销起来,很显然,自由裁量的公权是不需要“亲民”的,只有真正制衡好权力构架,来自于老百姓的权力才可能真正与老百姓心连心。

温总理的那把伞身体力行了一个官员的为官之本,更是一种发乎内心的道德自律。设若千千万万的人民公仆像温总理那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们的行政效率、政府公信等等可能都会豁然开朗起来。当然,仅靠舆论监督与道德引导是杯水车薪的,关键还是制度安排——再形而下地说,也许是该到了给我们的官员制订一套《生活规范手册》的时候了:一把伞事小,一颗心事大。邓海建

## 污染重镇何以入选宜居名镇

家门口,河水清静,这条河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织女河。不难想象,先前这个地方的风光该是多么的宜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从自然中得到了多么大的恩惠。村民是这样回忆的:过去,织女河波光粼粼,有时候螃蟹、乌龟晚上能爬到村民的院子里。河岸边的井水也特别甘甜。

织女河畔的大王镇,现在是山东的污染重镇。织女河早已鱼虾绝迹,水鸟飞离,连井水也不能喝了。似乎是个讽刺,全镇从里到外分明是连一块干净的地方都没有了,却入选了“中国最适宜人居新城名镇”,还戴上“全国环境优美乡镇”的荣誉花环。

大王镇已沦为山东响当当的“污染大王”,而为“污染大王”遮羞的是位居全省乡镇前列的该镇的各项经济指标。

对于老百姓而言,那些只能做官员政绩的经济指标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水喝。为不断攀高的经济指标不断付出的沉重代价是,此地既不优美了,也不宜居了,老百姓受空气污染之害和水污染之害,气儿都喘不匀了,且不少人正遭受病魔的折磨。

从经济学上说,一个地方生态灾难的产生,源自于长期的生产成本外化。就大王镇而言,表象是它非“绿色”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实际效果却是,资本将环境这部分隐性成本转嫁给了全镇的老百姓承担。就是说,资本获取不当利润,老百姓承受环境污染的危害。大王镇官员之所以很有大王气概,在于上级给他们脸上贴了很多荣誉之金,环境污染持续加重,他们的升迁之路反而更加畅通。资

本和官员形成共生关系,一荣俱荣,一利俱利,此种情况下,官员还在乎受污染之害的百姓的怨怒吗?

当下,受环境理念的影响,一般人都知道,生态环境与发展这一对关系,相当于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此不高深的说法,说出来都显得有点儿小儿科了,然而,人的劣根性之一便是,受利益推动,干事时,常常把小儿科都忘了。灾难都来临了,还睡在好梦中。大王镇现象不是唯一的现象,甚至还不是最严重的现象。今年,各地发生的生态灾难又多次,某一区域发生不可逆的生态崩溃也不是没有可能。什么样的推力能阻止更多的生态灾难呢?这就是个广泛的疑问,还是个容不得拖延的问题。罗金羽



## 漫画:暴力求才

江苏泰州姜堰中学举行“自主招生”考试,突然,另一所中学兴化中学的 30 多名老师闯进考场,撕毁学生试卷,想阻止考试进行。据悉,两所中学均为江苏泰州的重点中学,因姜堰中学接受已被录取为兴化中学高一新生的学生的考试报名,兴化中学才派出老师们前来大闹考场。

《扬子晚报》

## 税收屡创新高,公共服务能否同步高?

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以同比增长达 29% 的高速增长,接近 2.5 万亿元规模,这一数字超过 2003 年全年税收收入总额,创国家半年税收的新高。

“税收收入快速增长是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体现,增强了国家财政实力。”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李林军表示,我国的税收收入已占到财政收入的 95% 左右,是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税收的高增长将直接带来国家财政实力的增加。

税务总局统计数据表示,2003 年以来,全国税收年收入分别突破 2 万亿元、2.5 万亿元、3 万亿元、3.5 万亿元大

关,于 2006 年达到 3.7 万亿元,年增幅在 20% 左右。

不过,在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率创新高的同时,税收是否过重的议论也屡见报端,美国《福布斯》杂志日前发表的年度税负排名就曾指出,中国税负排名靠后。

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相关司负责人表示,总体来看,中国宏观税负与国际相比属于较低水平,宏观税负大大低于大部分工业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也高于中国 2005 年的宏观税负水平高出 6 至 9 个百分点。

“虽然我国税收收入增速明显快

于 GDP 的增长速度,但我国税收是以工商业增值税为税基,从工商业发展速度看,我国主体税种增长速度与相关经济发展基本协调。”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李林军介绍说,近年来工商业增加值实现了同比的高速增长,这决定了主要税种收入的高增长。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院教授安体富认为,在使用上,国家税收应继续向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公共产品方面倾斜,税收的增长不是目的,应该让更多人享有税收高增长带来的成果。

王宇

## 被审计出问题部门 为何集体失语?

国家审计整改呈现出“加速度”的迹象。日前,审计署向媒体通报,至少有 358.7 亿元违规使用的资金重新回到了“国库”。这也是审计署首次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审计报告后,能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向公众公布违规部门的整改情况。

一些问题资金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回归正途,审计署功不可没。但是,当我们为审计署的工作成效表达赞赏之时,也有一些遗憾:审计署发现和纠正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亡羊补牢”,那些被审计署曝光的相关部门才是事件真正的“主角”。但是,从被曝光到逐步整改,再到整改情况被审计署通报,人们更想听到来自“主角”的声音——面对批评,他们是什么态度?是否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下一步还有什么整改打算?这些问题,民众很难从审计署的“代言”中得到清晰的答案。

审计署审计出来的问题,都与公众利益关系极大。依据已经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尽管《条例》要到明年 5 月才正式实施,但其中所确定的政府信息对社会公众“公开、透明”的立法原则,理应为政府部门所时刻遵循。公众完全有理由要求被审计出问题的有关部门,主动对自身的整改情况做出说明。而主动站出来说明情况,也是被审计部门重塑形象、赢得信任的最佳途径。

然而,被审计部门大多选择沉默,这让审计部门承担着过多的压力,尤其是问责不力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几乎都集中到了审计部门身上。这些年来,公众在一次次“审计风暴”叫好的同时,却对接下来整改过程有诸多疑问:有些问题,有些部门年年审、年年犯,如果审计之后没有整改,还要“审计风暴”何用?这里,人们将审计整改的成效,作为衡量审计署工作的重要标尺。

然而,审计署不是查处部门,整改成效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在更大程度上,审计报告更像是一个“问题线索提供者”,报告公布后,应该有相关部门对审计问题进行调查,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而相应的,调查处理的进展和结果,最好也应由这些部门进行及时、准确、全面的公开。由审计到处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审计的“合力”,才是公众所期待的。

而且,在现阶段,审计体制采用的是隶属于政府部门的行政型审计模式,尽管对于一般的被审计单位而言,这种审计体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其独立性远不如立法型和司法型体制。比如,虽然法律规定审计机关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审计机关与其他机关共同行使行政权,审计部门的经费受制于本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约束。在这种情况下,被审计出问题的部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严肃认真对待审计结果,迅速有效推进整改工作,并不是审计部门所能把握的,而是取决于各部门自身以及更高权力部门的态度。

无疑,要让被审计出问题的部门站到公众面前来,直面舆论的拷问,取决于其权力被约束和制衡到什么程度。除了审计署的“风暴”之威,让人大履行强制性要求各部门做出解释、说明的权力,以及加大公众、媒体对各部门的监督能力,或许解决问题的办法。王汉